学术专论

“帝制之国”：思想资源与晚清“帝国”概念的生成

谈玉衡

［摘要］“帝国”是晚清传入中国的重要政治概念。现有研究在考察晚清“帝国”概念时往往强调其国家结构和统治手段方面的特征，而忽视其政体意义上“帝制之国”的含义。本文从“empire”概念传入东亚时的翻译实践入手，重新审视晚清“帝国”概念中“帝制之国”含义的生成，关注译者所调用的不同思想资源在其中的作用，以及近代国际体系转型中东亚文化圈对于“帝国”一词的改造和使用。一方面，译词“帝国”产生之初强调的恰恰是“empire”概念中“帝制”的内涵；另一方面，“empire”概念引入东亚后经过了汉文化传统的改造，成为中、日、朝三国维护自身国际地位的概念工具。

[关键词] 帝国 帝制 思想资源 翻译实践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6）－02－0135－015

一、晚清“帝国”概念的复杂性

学界在论及中文“帝国”概念的演变时，往往会援引1902年严复译作《原富》中的译注：“英拜尔近人译帝国，亦译一统，或译天下。亚洲之英拜尔若古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其欧洲则古希腊、罗马、西班牙、法兰西，今俄、英、德、奥，其王皆称帝者也。”[①] 这段话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西文“empire”概念进入中文时，除了“帝国”以外，译者至少还曾使用过两个现成的中国传统概念“一统”和“天下”来翻译它，但严复认为以上两种译法皆不妥，转而音译为“英拜尔”。第二，严复解释音译词“英拜尔”时，将“其王皆称帝也”作为它的规定性特征，是“帝制”而非其他，构成了欧亚古今“英拜尔”的共同点。

这不仅说明迟至1900年左右西文“empire”与中文“帝国”之间的对译关系尚未确定，而且暗示着晚清译者眼中的“帝国”概念与当代社会政治理论中的“帝国”概念在内涵上有相当

［收稿日期］ 2025－03－12
［作者简介］ 谈玉衡（1995— ），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whruc8@163.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比较视野下的大一统政治理论研究”（22AZZ001）阶段性成果。

① 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67页。

的距离。严复突出“帝国”为皇帝统治的政体形式这一特征；而当代社会政治理论则通常从国家结构和统治手段这两方面来定义“帝国”：一方面，“帝国”是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国家类型，具有“中心—边缘”结构，包含有大量异质性成分，与同质化的城邦和民族国家相对。[①] 另一方面，“帝国”国家形态的获得和维持往往采取特定的统治手段，如扩张、侵略、殖民等，也就是“帝国主义”式的统治方式。[②] 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严复的解释相比，当代社会政治理论并不关注“帝国”的政体形式，君主制和皇帝并非“帝国”的核心要素，即使是共和政体也可以是 empire。[③]

蓝弘岳认为，严复“将‘帝国’理解为一种君主制国家”是一种误读，因为“这不同于 Empire 原本语意”。[④] 但这一判断恰恰反映了当代社会政治理论对中文世界“帝国”概念史研究的影响。社会政治理论和历史学的结合固然有益，但是在研究概念的历史流变时，也需要警惕既有理论假设所导致的盲区。由于近代以来中文里的“帝国”概念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一些研究者便假定译词“帝国”应精准传达了西文“empire”的概念原意，并从国家结构和统治手段两方面解读中文史料中的“帝国”。如欧立德认为清政府第一次自称“大清帝国”的官方文件《马关条约》反映了清朝人对于大清国统治多元性的认识。欧立德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恰恰是因为他定义的“帝国”“建基在多元种族之上”，是“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所解释为重合的、多元的政治体系及管治权柄”，而“熟谙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必定知道‘帝国’词义”。[⑤] 刘文明则强调“帝国”“与政体形态无关，而是与殖民扩张紧密相连的强权国家”，从《马关条约》签订时中日交涉的具体情境来看，清政府并没有真正接受“帝国”话语。[⑥] 无论是欧立德强调“帝国”的国家结构特征还是刘文明强调其统治手段，都体现出当代社会政治理论的影响。在这种理论关照下，他们都认为“帝国”的政体形式不会是晚清中国人关注的内容。

但是，抛开政体形式这一维度，我们真的能够准确把握晚清中国人对帝国概念的理解吗？按照当代社会政治理论，严复以“帝制之国”理解“empire”是其西学知识不够而产生的误解。但考之史实，恐不尽然。事实上，在 19 世纪之前，“皇帝统治”或“帝制”一直是西方“帝国”概念的核心。詹姆斯·马尔登（James Muldoon）曾总结了欧洲历史上公元 800—1800 年间出现的多种“帝国”观念，尽管它们对最高权力的来源——来源于上帝还是来源于世俗选举——存在争议，但它们均认为由皇帝掌握最高权力是帝国观念的构成性要素。[⑦] 迄至 19 世纪，权威辞书和百科全书中仍然存在着以“皇帝统治”来定义“帝国”的情形。[⑧] 而在清末乃至民初的中

---

① 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8.

② “帝国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本文在此不涉及其具体的意义流变，只是取其最常见的含义，即：“国家扩大势力和版图的政策、行为和主张，特别是通过直接占领领土或对其他地区进行政治和经济控制来实现。”《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 8 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第 334 页。

③ 蓝弘岳：《“帝国”概念在汉文圈的翻译与流传：从幕末日本到清末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93 本第 1 分，2023 年。

④ 蓝弘岳：《“帝国”概念在汉文圈的翻译与流传：从幕末日本到清末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93 本第 1 分，2023 年。

⑤ 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 年 1 期；欧立德：《当我们谈“帝国”时，我们谈些什么——话语、方法与概念考古》，黄雨伦译，《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 6 期。

⑥ 刘文明：《“大清帝国”概念流变的考察》，《历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⑦ James Muldoon, *Empire and Order: The Concept of Empire, 800−1800*, St. Martin’s Press, 1999, pp. 15−18.

⑧ 狄德罗《百科全书》（1755 年版）：“（帝国是）一个君主制政府，所有统治权力都集中于一人”，“Empire.” In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vol. 5. Paris, 1755；1832 年版《韦氏大词典》“Empire”词条下开列了四个义项，其中第二个义项是：“（帝国是）一个皇帝享有管辖权和统治权的领土、地区或国家。帝国的领土范围通常比王国大。”Noah Webster,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Exhibiting the Origin, Orthography, Pronunciation, and Definitions of Words (tenth edition)*. S. Converse, 1832, p. 294.

国，“帝制之国”与“帝国”之间的联系也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于时人的言说之中，如 1923 年孙中山指出：“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① 作为国号的“帝国”与“民国”只有一字之差，却反映出深深扎根于时人头脑中的“帝国”含义，恰恰包含和强调了其政体形式的那一面。甚至在特定语境下，“帝国”的“帝制”特征比当代社会政治理论所强调的国家结构或统治手段更为关键。既有研究都潜在地从国家结构和统治手段两方面定义“帝国”，而极大地忽视了其政体形式方面的特征，没有看到“帝国—empire”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中文“帝国”一词在晚清这一特定语境下的特殊用法。

基于此，本文拟重新考察晚清中国人眼中的“帝国”概念，回到晚清中文“帝国”概念生成的时刻。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于中文“帝国”的概念史研究，更可破除某些因偷换概念而推导出的谬论。如欧立德从晚清“帝国”概念史的进路做出论证，认为晚清中国人已自我承认为一个“建基在多元种族之上”的“大清帝国”。② 本文之后的论述将说明，他不仅仅是以当代社会政治理论中的“帝国”概念取代了历史上的“帝国”概念，③ 更在此基础上误读了一连串的材料。

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是，在中西观念碰撞交汇的时刻，西学的“empire”概念是如何通过翻译实践固定为中文的“帝国”这一译名。翻译者对于不同思想资源的取舍影响了时人对“帝国”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塑造。译者所选择的汉字“帝”与“国”的组合接洽了西学“empire”的政体含义与中国传统皇帝制度，其结果是，不仅“帝制”成为“帝国”的核心元素，而且“帝国”被置于等级式的国家形态系列之中，以凸显其尊贵地位。

本文主要关注晚清“帝国”概念中“帝制之国”含义的生成，因此不讨论“帝国”在国家结构和统治手段这两方面的含义，并把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帝国主义”概念传入中国以前，即将时间下限划在 1899 年梁启超于《清议报》译介“帝国主义”。在此之后，“帝国”作为统治手段的含义很快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成为“帝国”概念的重要义项。“帝国主义—imperialism”概念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研究，本文不再赘述。④

如果以《马关条约》中清朝官方文件第一次自称“大清帝国”为界，1895 年以前，西文“empire”概念经由三类译者（西方人、中国人、日本人）之手，产生了两种翻译传统。第一种是以“empire”来对译已有的常见中文词“天下”和“国家”，这一翻译传统产生较早，主要代表是西方人和中国人。第二种则是用新造词或者不常见的中文词“帝国”来翻译“empire”，这一对译方式主要是被日本人使用，发明了和制汉语“帝国”，尽管在西方人和中国人那里也偶有出现。甲午后，和制汉语“帝国”进入中文，摇身一变为中文词汇“帝国”，并最终成为“empire”的标准中文翻译。因此，本文的讨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聚焦传教士的翻译实践，第二部分聚焦日本译者的翻译实践。这两部分着重关注两种翻译传统中不同译者对于“empire”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他们所调用的不同思想资源在其中的作用。第三节将目光转向中国，考察 19 世纪的中国士人和官员是如何使用“帝国”一词，以及中、日、朝三国如何利用“帝国”概念来争取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平等或优越地位。

---

① 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 8 卷，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23 页。

② 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 年 1 期；欧立德：《当我们谈“帝国”时，我们谈些什么——话语、方法与概念考古》，黄雨伦译，《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 6 期。欧立德的观点和论证引发了黄兴涛、葛兆光、汪荣祖、刘文明等众多学者的回应，此不赘述。

③ 曹新宇、黄兴涛：《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史学月刊》2015 年第 5 期。

④ 关于“帝国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演变，可参见陈力卫：《“帝国主义”考源》，《东亚观念史集刊》2012 年第 3 期；葛静波：《“帝国主义”在清末中国：译介、认识与话语》，《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

二、中译英：西方译者眼中的“天下”“国家”与“帝国”

以“天下”“国家”与“empire”互译的西方翻译传统，可见于近代来华传教士编纂的双语辞典。[①] 从 1822 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华英字典》开始，英文“empire”所对应的中文便是“国”和“天下”，而不是“帝国”。[②]1844 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③]、1847 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④]、1866—1869 年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的《英华字典》[⑤] 和 1872 年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的《英华萃林韵府》,[⑥] 其“empire”词条下都是“天下”“国家”或者“国”。1868 年中国人邝其照编纂的英汉字典《字典集成》也沿用了这一译法。[⑦]

为什么这些双语辞典没有把“empire”翻译为中文“帝国”？最简单的解释当然是因为此时中文尚没有“帝国”一词，更准确地说，没有必要为了翻译“empire”而创造新词，使用常用词“天下”“国家”或“国”便足以表达其内涵。但是，这一解释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从翻译实践的角度观察，最初编纂双语辞典的目的是便利外国人学习中文，主要把中文翻译成英文。反映在这些双语辞典所使用的语料中，这些双语辞典会大量引用中文语料，并提供英文翻译；而当代英汉辞典为了便利中国人学习英文而编写，例词例句多基于英文语料，并提供中文翻译。因此，更合适的提问方式应当是，为什么把中文“天下”“国家”或“国”翻译成“empire”？

英文“empire”是一种国家类型，以“empire”对译中文“国”“国家”较为容易理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把“天下”翻译为“empire”？[⑧] 这涉及一个重要的学术争论，西方的“帝国”概念能否用于解释中国的“天下”？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的“帝国”与中国的“天下”相似相通。[⑨] 另一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的差异更为关键，并提醒研究者，在跨文化“帝国”研究中，千万不能忽视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巨大差异。[⑩] 这些研究主要围绕西方的“帝国”理想与中国的“天下”理想，西方的帝国实践与中国的天下实践之间的异同展开讨论，本文则试图从翻译实践的角度回到“empire”与“天下”接轨的源头来进行观察。

---

① 耶稣会士们编纂的葡汉、拉汉等双语辞典虽然出现更早，水准极高，但实际上并没有刊行。19 世纪以来的双语辞典主流是英汉辞典。内田庆市：《近代中国人编英汉辞典的谱系》，邝其照著，内田庆市、沈国威编：《字典集成（珍藏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1 页。

②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III,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p. 139.

③ Samuel Wells Wil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英华韵府历阶》）,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4, p. 84.

④ W. H.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in Two Volumes*, The Mission Press, 1847, Vol. 1, p. 493.

⑤ Wilhelm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英华字典》). Daily Press Office, 1866–1869, Vol. 1, p. 723.

⑥ Justus 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wo Volumes Romanized in the Mandarin Dialect*（《英华萃林韵府》）, 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 1872, Vol.1, p. 162; Vol. 2, pp. 43, 194.

⑦ Kwong Tsun Fuk, *English and Chinese Lexicon Compiled in Part from Those of Morrison, Medhurst and Williams*(《字典集成》), De Souza & Co., 1868, p. 103. 载邝其照著，内田庆市、沈国威编：《字典集成：珍藏本》，第 49 页。

⑧ 在今天的英汉、汉英词典中，“empire”的翻译一般为“帝国”，而“天下”的翻译一般为“the world”和“the country”。

⑨ 汪晖：《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重印本前言）》，《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 1 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第 14–15 页。

⑩ 李扬帆：《“中华帝国”的概念及其世界秩序：被误读的天下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15 年第 5 期；成一农、陈涛：《王朝是“帝国”吗？——以寰宇图和职贡图为中心》，《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戴梅可：《古代中国“帝国”论》，穆启乐、闵道安主编：《构想帝国：古代中国与古罗马比较研究》，李荣庆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38–39 页。

如前所述，双语词典的编纂是为了便利外国人学习中文，因此，“empire”与“天下”的接轨首先是中译英的过程，而不是如人们通常所想象的英译中的过程。这意味着它是把“天下”翻译为“empire”。那么，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天下”是如何与“empire”关联起来的？本文认为，“天下”并不是直接与“empire”产生关联，而是借助“中国”这一中介联系起来的。以马礼逊为例，《华英字典》“Empire”词条下，有一条中文例句为：“Send officers over the whole empire, 遣官遍行天下”。[①] 仔细分析这一例句，我们可以尝试重建马礼逊的逻辑推理过程。首先，在“遣官遍行天下”这一例句中，“天下”其实指的是“全中国”，而非“全世界”。其次，马礼逊调用了“中国是一个 empire”的既有认知，因为早在 16—17 世纪，西方人就将“中国”识别为一个与罗马帝国类似的“empire”。[②] 最后，马礼逊得出结论：“天下”在具体的语境中也可以被译为“empire”。[③] 整个推理过程可以归结为如下的等式：“天下 = 中国 = Chinese Empire = empire”。其中，“中国 = Chinese Empire”是关键。

可以发现，从马礼逊确立了“天下”与“empire”的对应关系后，后续西方人编纂的英汉辞典无不延续了这一做法。同时，正是因为“天下 = 中国 = Chinese Empire = empire”，所有能被理解为“中国”的中文词，都有可能被翻译为“empire”，如马礼逊《华英字典》中的“社稷”,[④] 卫三畏的汉英字典《英华分韵撮要》中“九州”,[⑤] 都被译为包含定冠词、特指中国的“the empire”。反过来讲，英译中时，“empire”只有在指称“Chinese Empire”时才有可能被译为“天下”，不然便是按照中文习惯翻译为“国家”或者“国”，如“Empire of Manchoo Tartars”为“大清国”，“British Empire”为“英国”。

以上考察可以发现，西方人所编纂的双语辞典中并不存在中文“帝国”一词，但是欧立德指出，目前可考最早的以中文“帝国”翻译“empire”的实例出自西方传教士发行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而且显然并非受到日语翻译的影响。[⑥] 如果重新考察这一实例，则会发现欧立德误读了材料。事实上，这则材料说明，最早以中文“帝国”翻译“empire”的西方人所强调的恰好不是欧立德所谓“建基在多元种族之上”，而是“帝制之国”的含义。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15 年起由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发行，被称为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其 1820 年刊的“全地万国记略”（Sketch of the World）栏目中出现了中文“帝国”一词：“亚非利加之分有侯国、有王国、有帝国，又有多小国未有一定的朝政者。”[⑦]“全地万国记略”是介绍世界五大洲各国概况的系列文章，每部分的体例大致相同，分别为“论某洲之列国”“论某洲之朝政”“论某洲之话”。上面所引这句话出自“论朝政”部分。因此，此处亚非利加“帝国”所指为何，找出该栏目另外几篇的“论朝政”便可明了：

> 至论有罗巴列国之朝政，大概算之，则有君王二十八位。在其二十八位中，有三位称皇帝

---

①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III,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p. 139.

② 关于欧洲人是如何将中国识别为“中华帝国”，参见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 年 1 期；曹新宇、黄兴涛：《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史学月刊》2015 年第 5 期；陈波：《西方“中华帝国”概念的起源（1516—1688）》,《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5 期。

③ 对译中文“天下”的英文词汇并不限于“empire”，相反，一般情况下，“天下”被译为“the world”。参见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五车韵府》), London Mission Press, 1865, Vol.2, p.405.

④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III,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p. 157.

⑤ Samuel Wells Williams,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英华分韵撮要》),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56, p.25.

⑥ 欧立德：《当我们谈“帝国”时，我们谈些什么——话语、方法与概念考古》，黄雨伦译，《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 6 期。

⑦ 米怜主编，刘美华编校，张西平、谢辉审校：《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第 297 页。

者，有十一位称王者，又有十四位称君者也。①

论亚西亚列国之朝政：夫亚西亚列国之朝政大概归二样，即皇帝发之政与国王发之政。在亚西亚分称皇帝者有三，即中国帝一、日本帝一、五印度帝一。今此一帝只有名无权也。在亚西亚分称王称君者甚多，其数未详也。②

由上可知，"论某洲之朝政"具体讲的就是各国的政体形式，对于君主制国家尤其强调其君主的头衔，因此原材料实际相当于在说"亚非利加列国，有君王称侯者，有称王者，有称帝者，又有多小国未有一定君王者"，"帝国"只是"帝制之国"的简称。据后文，欧洲"三位称皇帝者"之国分别是"我罗斯国"（俄罗斯）、"阿士得耳以亚"（奥地利）和"度尔格国"（土耳其），非洲的"摩耳阿戈国"（摩洛哥）"此国君乃称曰皇帝"，③ 这几个国家确实也名为"empire"。因此，米怜在写作英文底稿时很有可能使用了"empire"一词，但他本意想要表达的实是"an empire whose sovereign is an emperor"，也就是一种与"emperor"紧密相关的"empire"概念。

无独有偶，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为"empire"加上了来自《韦氏辞典》的名词解释，第一个义项就是"Empire, the territory, region, or countrie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and dominion of an emperor"。④ 这说明近代西方人的 empire 观念中的确包含"国之君主为皇帝"这一要素，有此要素，即为"empire"。更重要的是，当时"empire"定义中包含诸多方面的含义，当传教士将其译介到中国和日本时，他们强调的恰好是"帝制"这一特征。

综上所述，西方译者以其固有观念"Chinese Empire"为桥梁，在中译英时为中文的"国家""天下"找到的对应物是"empire"；同时，由于他们把"empire"概念理解为"帝制之国"，因此也零星使用"帝国"来翻译"empire"。可以想见，当近代中国士人以这些双语辞典为参考来翻译西书时，"empire"就是"帝制之国"或"天下"的观念也渗透到了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之中。

三、从荷译日到英译日：日本语境下的"帝国"与"帝制之国"

需要注意的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出现的"帝国"属于零星的案例，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各种双语词典中的"empire"对译的都是"天下""国家""国"，而不是"帝国"。因此，吉村忠典认为，日文的"帝国"不是源于中国的文言文，而是一个首先由日本兰学者在翻译中创造的和制汉语。⑤ 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

与西方传教士的中译英的翻译传统不同，日本译者的翻译传统是将西文中的"keizerrijk"和"empire"译为和制汉语"帝国"。该词的译出语毫无疑问是日语，但最初的译入语却并非英语"empire"，而是荷兰语"keizerrijk"，这一荷译日的过程奠定了日语"帝国"中"帝制之国"含义的基础。

与前述"天下""国家"相比，和制汉语"帝国"具有强烈的复合词特征，是日语汉字"（皇）帝"与"国（家）"的组合。作为日语译词的"帝国"始见于 1789 年朽木昌纲的《泰西

---

① 米怜主编，刘美华编校，张西平、谢辉审校：《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 251 页。

② 米怜主编，刘美华编校，张西平、谢辉审校：《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 282 页。

③ 米怜主编，刘美华编校，张西平、谢辉审校：《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 290 页。

④ Wilhelm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英华字典》), Daily Press Office, 1866−1869, Vol. 1, p. 723. 据考证，罗存德参考的是《韦氏辞典》的 1847 年版。熊英：《罗存德及其〈英华字典〉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第 58 页。

⑤ 吉村忠典：《『帝国』という概念について》，《史学雑志》第 108 卷第 3 号，1999 年。

舆地图说》，对应的是荷兰语“keizerrijk”或“keizerdom”。[①]荷兰语“Keizer”为“皇帝”，“rijk”为“国”，二者各取一字则为“帝国”。需要注意的是，英语“empire”与荷兰语“keizerrijk”虽然含义相同，但其词源和形式却有本质差别。后者是一个由“Keizer”和“rijk”组成的复合词。“rijk”就是宽泛意义上的“国”（realm），可以对应英文的“kingdom”“empire”“state”，而“Keizer”则是源于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Caesar”，二者组合的字面含义便是“拥有 Caesar 头衔者所统治的疆域”。[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马礼逊等人将“empire”视作一个整体对应中文的“天下”“国家”或“国”，而日本人却为“keizerrijk”创造了一个复合词“帝国”，因为“keizerrijk”本身就是一个复合词。

日文“帝国”的复合性质引申出两个问题：第一，“帝国”是否就是“帝制之国”？从日文“帝国”的产生来看，它甫一出现便是在《泰西舆地图说》一书的“爵名”章下，这意味着和制汉语“帝国”与强调政体特征的“帝爵”相关。可以说，日语汉字“帝”与“国”的组合，无论从字面还是内容上都强调了它的君主制政体，即具有“帝”之爵位者所统治的国家。[③]第二，为什么要采用“帝”而不是“王”“侯”与“国”进行组合来构成“帝国”这个复合词？在该书的开端，朽木昌纲就解释其译名如下：“ケイセル”（德语 Kaiser；兰语 Keizer）译为“帝”；“コヲニンキ”（德语 König；兰语 Koning）译为“王”；“ヘルトグ”（德语 Herzog；兰语 Hertog）译为“侯”；“ホルスト”（德语 Fürst；兰语 Vorst）译为“小侯”。据此，蓝弘岳认为，朽木昌纲调用了汉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以汉文中“帝→王→侯”等爵位差异的顺序来理解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等欧洲国家。[④]但还可进一步追问的是，兰学者为什么没有采用“皇国”一词来对译“keizerrijk”，而是使用了“帝国”？“皇国”一词被当时的国学者用以凸显日本的优越性，将“皇国”视为一种最高的国家形态，如平田笃胤认为“皇国即天地之根源，所有事物均较万国为优”，“我国是万国的本国、祖国”，只有日本有资格称为“皇国”。[⑤]尽管兰学和国学在具体的政治理念上存在很大分歧，但它们都共享着儒学的思考框架，“皇→帝→王→伯”的治道阶序即是其中之一，“帝”只是爵位而非治道阶序的顶端。[⑥]因此，18 世纪末的兰学者未用“皇国”翻译“keizerrijk”可能是因为，“皇国”的逻辑与“keizerrijk”一词所蕴含的国家观念之间存在冲突，用专属日本的“皇国”来翻译世界历史上有众多的 keizerrijk，也就是将日本降等了。以“帝国”来翻译“keizerrijk”，一方面承认“帝国”高于“王国”和“侯国”，可以很好地处理西学知识与既有的儒家理念之间的对接；另一方面，将“皇国”保留给日本，不妨碍继续将日本的地位置于万国之上。

“帝国”一词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节点是 1814 年本木正荣编纂的第一部英日词典《谙厄利亚语林大成》，这部词典完成了法语“empire”和英语“empire”与日语“帝国”之间的对译。本木正荣参考的法荷 / 荷法辞典，把荷兰语“keizerrijk”与法语“empire”视为等同，并解释后者

---

① 朽木昌纲：《泰西舆地图说》卷 1，宽政一年，第 2 页。吉村忠典认为对应的是荷兰语“keizerrijk”，陈力卫认为是“keizerdom”，不过二者意思相同。参见吉村忠典：《『帝国』という概念について》，《史学雑志》第 108 卷第 3 号，1999 年语；陈力卫：《“帝国主义”考源》，《东亚观念史集刊》2012 年第 3 期。

② 例如罗马帝国一般叫作“Romeinse Rijk”，但是当强调罗马由共和国变为帝国时，可以称之为“Romeinse Keizerrijk”。另一个类似的构词例子是英国（United Kingdom），它的荷兰语为“Verenigd Koninkrijk”，“Koninkrijk”就是由“王”（koning）与“国”（rijk）复合而来。

③ 吉村忠典：《『帝国』という概念について》，《史学雑志》第 108 卷第 3 号，1999 年。

④ 朽木昌纲：《泰西舆地图说》凡例，宽政一年，第 2 页。蓝弘岳：《“帝国”概念在汉文圈的翻译与流传：从幕末日本到清末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93 本第 1 分，2023 年。

⑤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12–113 页。

⑥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参见孙明：《治道之统：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原型与定型》，第一章“从‘皇帝王伯’到‘失其统’——古代中国治道思想资源的层累与递嬗”，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23 年。

为“domination d’un empereur”，即“皇帝的统治”。吉村忠典认为，由于本木正荣尚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君主的国家，便很自然地认为日语“帝国”恰当地翻译了荷兰语“keizerrijk”和法语“empire”中“帝制之国”的含义，而法语“empire”与英语“empire”同形，于是便得出了“荷兰语‘keizerrijk’= 日语‘帝国’= 英语‘empire’”的结论。英语“empire”与日语“帝国”之间的关系便由此建立。[①] 从这个过程来看，日文“帝国”仍然是对西文“empire”概念中“帝制之国”的翻译。

需要注意的是，在幕府末期和明治时期，与“帝国”论述相关的学术思想除了兰学的翻译实践外，还有儒学和国学，它们对兰学的“帝国”论述多有不满。江户后期水户藩的名儒会泽正志斋一方面与朽木昌纲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资源，将“帝国”一词置于“帝→王→侯”等级秩序观中加以定位，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兰学者以“帝”来翻译“Keizer”，因为“帝”是最尊贵的称号，只有日本和中国有资格享有。大国隆正则进一步提出“大帝爵”论，在传统儒家华夷思想和新近传来的《万国公法》这两种秩序原理之间，构建起第三种秩序主张：日本中心论的天下秩序。他强调日本作为一个“帝国”的优越性，认为日本才是地球上万国中之唯一真正的“帝国”，可堪当“总帝国”，可实现大帝爵。[②] 竹尾正胤更于 1863 年出版《大帝国论》，继承了兰学书中已有的等级制国际秩序观，提出一种“帝国”“王侯”“共和政治”等国家体制所组成的国际秩序观，认为只有日本是贯通全世界的“大帝爵国”，其他皆是私自僭称的“伪帝国”。[③] 儒学和国学的“帝国”论述当然与开埠以来日本所处之国际形势有关，一方面，面对列强，他们不得不接受“帝国”的定位，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放弃“皇国”的理想，遂以“总帝国”“大帝爵国”的方式在承认日本为帝国之一分子的前提下抬高日本的地位。

在当时的政治和外交实践中，天皇逐渐被塑造为拯救民族危机、建设现代国家的核心，这也进一步加强了日语“帝国”的“帝制”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帝国”之“帝”究何所指则经历从“幕府将军”到“天皇”的转变。开埠之初，日美两国签订《日美和亲条约》时，签订条约的主体是以将军为首的幕府，德川将军一度被称呼为“the Emperor of Japan”。幕末的大国隆正认为，日本的天皇与外国的元首对等地缔结条约，是与皇国绝对主义相矛盾的。因此，他主张由公（德川将军）与外国诸王做礼仪对等的交际，而天皇则作为“统辖万国之君”立于更高的位置。他认为这才是高明于欧洲国际法的“真正”国际秩序。[④] 作为明治维新精神领袖的吉田松阴则主张，天皇才是代表日本的 Emperor，只有当天皇成为真正的国家元首，而不是由幕府将军充当国家元首时，日本才能维持“帝国”的身份。[⑤] 到了《明治宪法》，其首条便强调“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即以宪法的形式将天皇与“帝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强化了“帝国”的“帝制”特征。

综上所述，和制汉语“帝国”的产生是日本近世历史进程的产物。在德川幕府的“禁教体制”下，荷兰成为当时日本人接触西学的唯一窗口。[⑥] 正是由于这一机缘，荷兰语“keizerrijk”成为日本人首先接触到的西学中的帝国概念。也正是在翻译“keizerrijk”的过程中，“帝制”成为和制汉语“帝国”的核心要素，并对后来翻译英语和法语的“empire”形成了路径依赖。伴随近代日本国家的发展和对天皇地位的强调，“empire”概念中的“帝制”面相不仅没有被消弭，

① 吉村忠典：《『帝国』という概念について》，《史学雑志》第 108 卷第 3 号，1999 年。
② 高伟：《日本近世国学者的华夷论与自他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225 页。
③ 蓝弘岳：《“帝国”概念在汉文圈的翻译与流传：从幕末日本到清末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93 本第 1 分，2023 年。
④ 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1992 年，第 146 页。
⑤ 山口宗之：《吉田松阴》，第九章“天皇绝对的思想”，马安东译，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⑥ 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157–163 页。

反而被不断强化。和制汉语“帝国”一词的用法始终与“帝制”缠绕在一起，以至于吉村忠典要批评当代很多日本人仍然会以有无“皇帝”来判断是否为“帝国”。①

需要说明的是，迟至19世纪中叶，来华传教士和日本人所开创的这两种翻译传统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体现在一个看似矛盾的案例中：传教士麦都思先后编写过英日词典和英汉词典，在1830年出版的英日词典中，“empire”译为日语的“帝国”；但是，在1847年出版的英汉词典中，“empire”则译为中文的“天下”和“国家”，而不是“帝国”②。

四、中国语境下的“帝国”与“帝制之国”

回到晚清中国“帝国”概念的生成问题，中国人是如何使用“帝国”一词的？中文古文献里“帝国”一词并不常见，③晚清“帝国”一词的出现和使用与翻译相关。那么，以上来华传教士和日本人的两种翻译传统对中国人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简单地讲，这两种翻译传统共同构成了1895年后中国人理解“帝国—empire”的知识背景和思想资源。但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界尚有争议。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和刘禾的《语际书写》将这一影响追溯至严复译《原富论》，但表示无法确定“帝国”是日语借词还是来自传教士。④黄兴涛认为“帝国”就是来自日语的借词或回归汉语借词。⑤沈国威则将“帝国”称为日语借形词。⑥欧立德强调译词“帝国”的产生要早于赴日留学，是西方和中国翻译者与外交官员共同努力的结果。⑦刘文明则批评欧立德的案例或指中文传统的“帝制之国”，或为“和制汉语”，并非中文译词。⑧

这些争论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中文书写中的哪些“帝国”语词源自翻译？第二，如果该“帝国”属于译词，那么它提取了原词的哪个义项？第三，在新的语境中，“帝国”是否发展出了新的含义？本节将从这三个问题入手分析甲午之前和甲午时期中文“帝国”概念的发展。

（一）甲午战争前的中文译词“帝国”辨析

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所签订的各种条约文本中，外文版出现“empire”的地方，中文版并没有对译为“帝国”，清政府的自我认同是“大清”和“大清国”，并非“大清帝国”。⑨但是，这一时期也确实存在少量中国人使用“帝国”的案例，它们或是西文“empire”的译词，或是对应日文“帝国”，而且翻译时往往强调其“帝制之国”的含义。下文拟通过重新考察1895年以前几条涉及中文“帝国”一词的材料，更清晰地呈现中文“帝国”、英文“empire”、日语“帝

① 吉村忠典：《『帝国』という概念について》，《史学雑志》第108卷第3号，1999年。

② W. H. Medhurst, *An English and Japanese, and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Lithography, 1830, p. 3; W. H.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the Mission Press, 1847, Vol. 1, p. 493. 陈力卫指出麦都思并未去过日本，他的日语知识可能来自荷兰人或者日本漂流民，参见陈力卫：《“帝国主义”考源》，《东亚观念史集刊》2012年第3期。

③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1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3−25页；刘文明：《“大清帝国”概念流变的考察》，《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王子今列出了“帝国”语辞早期出现的例证，认为古代文献“基本没有‘帝国’一词”之说并不确实，但也承认在传统政治史记述以及通常的政论中确实并不常用“帝国”一语。参见王子今：《“帝国”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国际汉学》2024年第2期。

④ Federico Masini, “App. II. Vocabulary of neologisms in XIXth century texts”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1898”.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6(1993), pp. i-iv, 168−169；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附录A，第299页。

⑤ 黄兴涛：《文化史的视野：黄兴涛学术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9页。

⑥ 沈国威：《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64页。

⑦ 欧立德：《当我们谈“帝国”时，我们谈些什么——话语、方法与概念考古》，黄雨伦译，《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⑧ 刘文明：《“大清帝国”概念流变的考察》，《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⑨ 刘文明：《“大清帝国”概念流变的考察》，《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国”所共有的“帝制之国”含义。

第一条材料来自1850年梁廷枏的《夷氛闻记》：

> 是月，伯麦偕义律驶五商舟（未敢以兵往）赴天津陈诉。（奏云：英吉利国臣统领本国水师主帅子爵巴儿免多，谨呈天朝大清国大皇帝驾下：窃巴儿免多现奉敝国主命，协同本国陆路统领总兵官布尔利，带领水陆军兵战船，前来贵国……窃思欧罗巴洲各国，即大国小邦帝国王邦，无分统属……）[①]

这条材料被欧立德识别为中国士人最早以汉语“帝国”翻译西方“empire”的用例，是梁廷枏对欧洲政治主权不同结构的观察。欧立德强调，在梁廷枏的观念中，清朝不属于某种“建基在多元种族之上”的“empire”。[②]刘文明则认为，梁廷枏所指仍是传统的“帝制之国”，与西义“empire”无关。[③]但是，通读上下文便会发现，这一段记述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方代表伯麦和义律投递的巴麦尊《致大清皇帝钦命宰相书》。换言之，这是一篇译文，是英国人对欧洲政治的观察，而非梁廷枏自己的观察。欧立德和刘文明对此处“帝国”一词使用情况的看法都不尽准确。首先，它是目前可查中国人最早使用“帝国”来翻译“empire”的译例，而不是像刘文明所言与“empire”无关。在这一点上，欧立德的判断是对的。其次，它所表达的既不是欧立德所说的国家结构的含义，也不是统治手段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而是作为政体形式的“帝制之国”含义。在这一点上，刘文明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第二条材料来自钱德培1877年至1884年的《欧游随笔》：

> 奥君系王而兼帝者也。帝国曰奥，王国曰翁搿阿，一名马加。[④]

这条材料也被欧立德识别为早期中国士人翻译西方“empire”的又一用例，是他们对于世界政治中“基于异质性和差异性”的政治体的描述。[⑤]但是，这条材料实际只是反映了钱德培对于“帝制之国”的关注。根据1867年的奥匈协议，奥匈帝国的正式名称是“奥地利—匈牙利君主国”，君主的称号是“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钱德培可能认为这种做法相当不可思议，值得专门一书。对于中国人来说，“帝”和“王”是两个不同等级且不兼容的头衔，可以由王而称帝，但绝没有“王而兼帝”的道理。在此，当时的中国士人与日本人共享着汉文化圈“帝→王→侯”的等级秩序观。总而言之，就上下文来看，钱德培这里对于“奥匈帝国”的描述侧重于它“二元君主国”的政体形式，“帝国”既是“empire”的译词，又表达了“帝制之国”的含义。

第三条材料是1877—1882年黄遵宪驻日期间所著《日本杂事诗》：

> 立国扶桑近日边，外称帝国内称天。纵横八十三州地，上下二千五百年。
>
> 小注：……内称曰天皇，外称曰帝国。隋时，推古帝上炀帝书，自名“日出处天子”。余此诗采摭诸书，曰皇曰帝，悉从旧称，用《公羊传》“名从主人”之例也。[⑥]

刘文明认为此处黄遵宪所用“帝国”与李鸿章等人所见的“帝国”都只是日本语境中从“empire”翻译而来的“帝国”。[⑦]此话固然不假，但黄遵宪“名从主人”的说明值得注意。[⑧]无论黄遵宪是如何理解或是看待日文“帝国”，在为当时的中国读者做介绍时，他考虑的显然是读

---

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邵循正点校，中华书局，1959年，第46–47页。

② 此处欧立德将梁廷枏的《夷氛闻记》误记为《夷氛纪略》，后者可能是赘漫野叟的《庚申夷氛纪略》。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年1期。

③ 刘文明：《“大清帝国”概念流变的考察》，《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④ 钱德培、李凤苞：《欧游随笔　使德日记》，岳麓书社，2016年，第129页。

⑤ 此处欧立德断句有误，将其引用为“奥君系王而兼帝者也。帝国曰奥。王国曰翁搿阿一名”。参见欧立德：《当我们谈“帝国”时，我们谈些什么——话语、方法与概念考古》，黄雨伦译，《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⑥ 黄遵宪著，陈铮主编：《黄遵宪集》第1册，中华书局，2019年，第14页。

⑦ 刘文明：《“大清帝国”概念流变的考察》，《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⑧ “名从主人”出自《穀梁传·桓公二年》，《日本杂事诗》此处将其记为《公羊传》当属笔误。

者可能提出质疑：日本小国何敢称皇称帝？他因而辩解，此诗只依循了经传中的“名从主人”之例，这似乎表明他并不赞同日本确有“天子”“帝国”之实。可以看到，作为作者的黄遵宪与他所预想的读者群体，被中文“帝国”两字唤起的仍然是“皇帝之国”的想象。

综上所述，在1895年以前中国人有限几次使用中文“帝国”的材料中，写作者高度关注“帝国”的政体形式。“帝国”两字几乎总是与帝国的君主“皇帝”紧密相连，这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君主称“皇”称“帝”的国家是为“帝国”，“帝国”乃“帝制之国”的简称。这一叙述模式既可见于对应西文“empire”的中文译词“帝国”，又可见于对应和制汉语“帝国”的中文译词“帝国”。

（二）“帝制”“帝国”与东亚政治实践中的天下体系

强调“帝制之国”含义的西文“empire”、和制汉语“帝国”和中文译词“帝国”，构成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李鸿章的前理解。在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过程中，李鸿章等人已经与日方就君主称谓和国号称谓对等问题做过一番拉扯，日方要求条约开头以“天皇”和“皇帝”并称，约内条款以“大清国”与“日本国”并列，李鸿章的最终回复：“所有条规开首，浑含其词，及章程内分写两国，仍称中国及日本字样，均尚得体。”① 即条约开头只写“大清国”和“大日本国”而不写君主称谓，约内条款保留“中国”和“日本国”。韩东育指出，李鸿章未能意识到“大日本国”与“大清国”的并列意味着日本谋求与中国对等首次化为现实。② 到了《马关条约》，刘文明指出，外交程式中双方代表对等的原则，促使李鸿章以“大清帝国”与“大日本帝国”对称。③ 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本文想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大清帝国”与“大日本帝国”对称能够体现对等原则？为什么写作“大清国”与“大日本帝国”时，便会产生某种不对等的感受？“帝国”的称谓何以高于“国”？或者说，“帝国”为什么是一种最高的国家类型？

本文想要指出，“帝国”是最高国家类型的观念恐怕并不直接来自西方。尽管文明等级论是西方帝国话语的重要成分，但该观念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是值得商榷的。19世纪流行一时的“自由帝国”（Liberal Empire）理论的确主张文明等级论，④ 但是，在这个文明等级中，非西方世界是处于低人一等的位置。因此，如果中日两国采用这种帝国观念，无疑是自我贬损。事实上，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在中日都影响深远，其推行的近代国际法体系的基本单位是“国”，主权国家之间交往以平等为原则：“就公法而论，自主之国，无论其国势大小，皆平行也。”⑤ 吉村忠典指出，《万国公法》的论述了超越君主“称号”，围绕“自主之国”之间的平等关系进行，使日本人学会把“帝国”理解为“国家”的一种，并将“帝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下位概念。⑥ 因此对于当时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他们所接收的西学国际法知识是，“empire”与其他“自主之国”地位对等，中、日两国同为“自主之国”，无论国号如何书写，都不应有上下之分。

在这个传统天下体系与现代国际体系交错的时刻，“帝国”称谓高于“国”的观念更有可能源于汉文化中“皇帝”与天下体系的观念。如上所述，当时日本的士人也不满意《万国公法》

---

① 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中华书局，2008年，第3308页。

② 韩东育：《日本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对〈中日修好条规〉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

③ 刘文明：《“大清帝国”概念流变的考察》，《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④ 关于自由帝国的讨论，可以参考珍妮弗·皮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金毅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⑤ 惠顿：《万国公法》，丁韪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页；何勤华：《〈万国公法〉与清末国际法》，《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⑥ 吉村忠典：《『帝国』という概念について》，《史学雑志》第108卷第3号，1999年。

的平等秩序，而是在汉文化等级制国际秩序观的引导下，提出了日本是“大帝爵国”的主张。事实上，汉字“帝”给人带来的与“皇帝”称谓紧密相连的印象，开辟了将“帝国”纳入中国传统天下体系中来加以理解的可能性。在天下体系中，中国皇帝册封外藩来朝的君主为王侯，建立起“宗主国皇帝—藩属国王侯”的等级体系。在这一语境中，与中国交往而自称“国王”，潜在地意味着国君为藩臣，低中国皇帝一等，而国家为藩属国，低宗主国中国一等；反之，由王而称帝，则意味着与中国平起平坐。在东亚的政治实践中，我们的确看到了基于此种观念展开的政治操作。古代越南君主灵活地掌握了称帝与称王之间的区别，对内建立以“大越皇帝”为主体的政治体系和区域朝贡体系，对外则接受中国的册封以“安南国王”名义称臣。① 近代朝鲜则是将称帝作为表明朝鲜相对于中国独立自主地位的表征。在日本的压力下，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被迫解除，1897 年，朝鲜高宗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其与中国对等的核心，便在于君主称帝。②

天下体系中宗主国皇帝与藩属国国王之间的上下等级关系，通过“皇帝之国”的含义，进入到日文“帝国”的政治内涵。在扩张殖民的过程中，日本综合地运用了“朝贡体系”/“宗藩体系”和“万国公法”的理论逻辑。③ 日本吞并琉球时，左院（元老院）提出：“我皇国现为东西方所熟知之帝国，皇国之下有王国、诸侯国等已是自然之事，我们册封琉球王国，使之成为我们的王国或诸侯国，同样可以为我所用，因此不妨去除其藩号，直接呼之为琉球王，这也不影响琉球归属日本的事实。”④ 此处的“帝国”（“皇国”）俨然成为宗主国的代名词，并反过来赋予日本作为宗主国册封藩属国的权利。如“东洋中称为帝国者，独有中、日二国而已”⑤ 的表述，既是对日本与中国对等的重申，又是对中、日国家类型的定性。既然中国为“帝国”，那么“帝国”便成为中国天下体系中宗主国的代名词，从天下体系的观念出发，作为宗主国的“帝国”无疑居于顶端，是体系内高于其他国家的存在。

那么，对于中日谈判现场的李鸿章来说，是否也经历了类似的推理过程？如上文所述，1895 年以前，使用中文“帝国”翻译“empire”的案例寥寥无几，即便如欧立德和刘文明所言，李鸿章已经接触甚至熟谙西学的“empire”概念，⑥ 但李鸿章能否迅速地将所见和制汉语“帝国”与“empire”结合起来也尚未可知。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李鸿章或是咨询了日文“帝国”的含义，或是望文生义地直接由“皇帝”的至尊地位推理出“帝国”的至尊地位。在后一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如沈国威所言，由于使用汉字，日语作为一种外语的感觉不很强烈，时人常常错以为只要去掉日语文献中的日语假名，适当调整词序就可以读解。⑦ 因此，李鸿章更有可能是凭借自己的中文知识直接解读日语中的汉字“帝”与“国”的组合，参考日本天皇解读出“帝制之国”的意思，并基于中国已有的“帝→王→侯”的等级观念和“王国”“侯国”等词语去理解“帝国”。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帝国”是最高国家类型的观念不仅不困难，反而相当容易。无论如何，“帝国”一词激发了战败方代表李鸿章某种维护大清尊严的心境，如刘文明所观察到的，

---

① 叶少飞：《越南古代“内帝外臣”政策与双重国号的演变》，《形象史学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② 杨杨：《近代韩国文明意识的转换及对中国认知的变化》，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 年，第 70 页。

③ 韩东育：《日本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对〈中日修好条规〉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陈多友、邓宇阳：《冲绳抑或琉球？——从日人叙述看琉球的历史定位》，《开放时代》2016 年第 4 期。

④ 下村富士男：《明治文化资料丛书 4 外交篇》，风间书房，1962 年，第 8–9 页，转引自陈多友、邓宇阳：《冲绳抑或琉球？——从日人叙述看琉球的历史定位》，《开放时代》2016 年第 4 期。

⑤ 《附日本竹添进一上书》，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2 卷《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497 页。

⑥ 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 年 1 期；刘文明：《“大清帝国”概念流变的考察》，《历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⑦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 年，第 328 页。

在信函中不厌其烦地写上自己的全部职衔，以表明自己地位不逊于伊藤博文。[①] 类似的心境转变与“帝国”理解的关系还可见于当时的报刊。1887 年 3 月 9 日《申报》刊登了光绪帝亲政大典上日本外务卿的祝词：“本大臣今代日本帝国，以友好之情祝此盛典，现在日本帝国与今日亲政之大清国大皇帝，两国交谊，比史传以前更加亲密。”[②] 此时的报刊编者只是照录“日本帝国”一词，似乎并不以为称日本自称“帝国”有需要删减之处。但是在 1894 年 8 月 3 日即甲午战争正式宣战后，《申报》刊登了《醒日书》一文，称：“然我料日人梦境方酣，决不乐人之唤醒，则我中国惟有厉兵秣马，从事疆场，毁其师船，歼其士卒，乘战胜之势，直捣扶桑，使彼泥首求成盟于城下，然后责令此后不准自称帝国，永远与高丽同隶藩封。”[③] 此处对于日本自称“帝国”的禁止，是报刊编者开始意识到该词挑战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

综上所述，晚清东亚各国的外交实践与国号变化，反映了汉文化传统思想资源中的“皇帝”与天下体系对于“帝国”概念的影响。“帝国”成为宗主国的代名词，而天下体系中皇帝高于王侯，宗主国高于藩属国的等级体系，产生了“帝国”是最高国家类型的观念，并且在天下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中被东亚各国灵活地加以运用。

五、结语

本文的讨论止步于 1899 年“帝国主义”概念传入中国以前。至甲午为止，中文语境中的“帝国”一词所凸显的均是“帝制之国”的含义，而强调国家结构或统治手段的含义属于后起。自 1899 年梁启超从日文译介“帝国主义”，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帝国主义”意义上的“帝国”含义逐渐压倒了“帝制之国”的含义。尽管如此，“帝制之国”的含义并未从“帝国”概念中消失，它始终或隐或显地出现在中国学界乃至于普通老百姓的思维观念里。如前所述，1902 年，严复主张将“帝制”作为“英拜尔”的规定性特征；1923 年，孙中山仍然视“帝国”为“皇帝一人为主”。1921 年，蔡东藩在《民国演义》开篇讲：“什么叫作民国呢？民国二字，与帝国二字相对待”，“从前的中国，是皇帝主政”，“帝字是一人的尊号，民字是百姓的统称”。[④] 此三人，一为对西学有深入了解的知识精英，一为伟大的革命家，一为著名的通俗历史作家，可以说代表了清末民初不同知识群体对“帝国”一词的理解。从三人的表述中可以发现，“帝制”的内涵仍顽强地存活在“帝国”一词之中。但是，既有研究忽视了晚清“帝国”话语中政体的维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当代社会政治理论对“帝国”概念史研究所造成的影响。

本文的讨论在如下三个方面深化了学界关于晚清“帝国”概念史的认识。

第一，凸显了晚清“帝国”概念中“帝制”的内涵，校正了既有“帝国”概念史研究过于偏重国家结构或统治手段的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材料误读。通过重新考察中文译者文本中的译词“帝国”，本文发现，不论该词对应的是西文“empire”还是和制汉语“帝国”，都契合了时人对于“帝”与“国”两字组合的直观感受，即“帝国”为一“帝制之国”。

第二，强调思想资源在跨文化的翻译实践中的作用。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日本人，他们在翻译过程中都调用了不同的思想资源：西方译者以其固有观念“Chinese Empire”为桥梁，在中译英时为中文“国家”“天下”“一统”等概念找到了其英文对应物“empire”；日本译者则是在荷译日和英译日的过程中，借助汉文化圈的“帝→王→侯”等级式政治秩序，将日语汉字“帝”和“国”组合起来表达“empire”概念中“帝制之国”的含义。

---

① 刘文明：《“大清帝国”概念流变的考察》，《历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② 《恭祝亲政大典纪盛》，《申报》1887 年 3 月 9 日第 1 版。

③ 《醒日书》，《申报》1894 年 8 月 3 日专栏第 1 版。

④ 蔡东藩：《民国演义》，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 页。

第三，将“帝国”的概念史研究和政治史研究结合，分析了“帝国”概念在东亚政治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晚清以降，中、日、朝三国借助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的天下观念和“帝→王→侯”的等级体系观念，对“帝国”概念进行改造，并灵活运用改造后的“帝国”概念为自身的政治交往争取平等乃至优势地位。

References

Burbank, Jane and Cooper, Frederick.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Cao Xinyu and Huang Xingtao. “Ouzhou cheng zhongguo wei ‘diguo’ de zaoqi lishi kaokcha” (Early designation of China as Empire by the Europea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hixue Yueka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5 (2015).

Chen Li-wei. “‘Diguo zhuyi’ kaoyuan” (An etymologist of “Imperialism”). *Dongya guannianshi jik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East Asia) 3 (2012).

Chenbo. “Xifang ‘zhonghua diguo’ gainian de qiyuan (1516−1688)” (The origin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Europe 1516−1688). *Sichu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2017).

Gao Wei. *Riben jinshi guoxuezhe de huayilun yu zita renzhi* (The Huayi and self-other understanding of Japanese Guoxue scholars). Beijing: Shehui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18.

Ge Jingbo. “‘Diguo zhuyi’ zai qingmo zhongguo: yijie, renshi yu huayu” (“Imperialism” in China in late Qing Dynasty: translation, understanding and discourse). *Xinandaxue xuebao (shehui keuxeban)*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2019).

Huang Xingtao. *Wenhuashi de shiye: Huang xingtao xueshu zixuanji* (The vision of cultural history: Huang Xingtao’s academic selected collections). Fuzhou: Fujian jiaoyu chubanshe, 2000.

Lan Hung-Yueh. “‘Diguo’ gainian zai hanwenquan de fanyi yu liuchuan: Cong mumo riben dao qingmo zhongguo” (The translation and spread of the concept of “Empire” within the literary Chinese sphere: the Bakumatsu period to late Qing China).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93, 1 (2023).

Li Yangfan. “‘Zhonghua diguo’ de gainian jiqi shijie zhixu: Beiwudu de tianxia zhixu”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world order: a misinterpreted *Tianxia* order). *Guoji zhengzhi yanjiu*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5 (2015).

Liu Wenming. “‘Daqing diguo’ gainian liubian de kaocha”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volution of the “Great Qing Empire” concept). *Lishi yanjiu* (Historical Research) 3 (2022).

Masini, Federico.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1898”.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6 (1993).

Muldoon, James. *Empire and Order: The Concept of Empire, 800−180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Shen Guowei. *Hanyu jindai erzici yanjiu: Yuyan jiechu yu hanyu de jindai yanhua*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two-word words: linguistic contact and modern evolution of Chinese). Shanghai: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9.

Shen Guowei. *Jindai zhongri cihui jiaoliu yanjiu: Hanzi xinci de chuangzhi rongshou yu gongxiang* (Studies on the vocabul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creation, acceptance and share of new Chinese words). Beijing: Zhonghuashuju, 2010.

Sun Ming. *Zhidao zhitong: Chuantong zhongguo zhengzhi sixiang de yuanxing yu dingxing* (Zhidaozhitong: The prototype and fin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shudian, 2023.

Wang Hui. *Xiandai zhongguo sixiang de xingqi* (The Rise of Modern Thoughts of China).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shudian, 2015.

Wang Zijin. "'Diguo' gainian zai zhongguo gudaishi yanjiu zhong de 'shiyongxing'" ("Suitability" of the concept "Empire" in research on pre-modern Chinese history). *Guoji hanxue* (International Sinology) 2 (2024).

Ye Shaofei. "Yuenan gudai 'neidi waichen'zhengce yu shuangchong guohao de yanbian" (The inside-emperor and outside-king policy and dual national titles of ancient Vietnam). *Xingxiang shixue yanjiu* (Image Historical Studies) 1 (2016).

Zhao Deyu. *Xixue dongjian yu zhongriliangguo de duiying*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ina and Japan). Beijing: Shijie zhishi chubanshe, 2001.

Zhu Qianzhi. *Riben zhexueshi* (History of Japanese philosophy).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2002.

"A State Ruled by An Emperor":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Empire" (*Diguo*)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TAN Yuh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hruc8@163.com)

Abstract: "Empire" was a crucial political concept introduced into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of "empire" in the late Qing often emphasizes its characteristics related to state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methods, while overlooking its meaning as "a state ruled by an emperor" in terms of political system.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s of the concept "empire" when it was introduced into East Asia, re-examines the formation of the meaning of "a state ruled by an emperor" in the late Qing concept of "empire," and focuses on the role of different intellectual resources invoked by translators, as well as the adaptation and use of the term "empire" within the East Asian cultural sphere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On the one hand, the translated term "empire" initially emphasized precisely the "imperial rule" connotation within the concept of "empire"; on the other hand, after its introduction into East Asia, the concept of "empire" underwent adaptation through Han cultural traditions, (especially the idea of "*tianxia*") becoming a conceptual tool for China, Japan, and Korea to maintain their international status.

Keywords: empire, a state ruled by an emperor, intellectual resources, translation practice